

大獎的 Stephen R. Platt 新作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2)，將19世紀中期東西半球同時發生的兩場「內戰」——太平天國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並置比較，考察英國政府在此兩場戰爭中發揮的作用，聯繫當時的國際政治和世界貿易，從全球史的角度解構了人們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陳舊理解。而梅爾清新著的最大亮點，便是另尋切入角度，再次對研究範式推陳出新。她剝離了附着於此一或稱為叛亂、或稱為起義、或稱為運動之事件表面的外在因素，就大規模戰爭的最直接後果——對社會民生之破壞進行關注，確是視角犀利之舉。而緊跟視角轉換之後的，便是對材料的「另類」解讀：對過去被認為政治性太強、充滿過度誇張的情緒表達、與革命範式疏遠的下層文人記述加以重視和重新檢討。暴力和紀念重構了戰後的地方社會，而下層士紳的敘述則體現出平民百姓對戰後政治和社會境況的理解。從底層人的身上看這場戰爭對於民眾的衝擊、對於國家的創傷，是對後世關乎此場戰爭之英雄主義敘事的一聲冷嘲。

胡簫白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陳明，《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626頁。

對於傳世文獻相對有限的中古史的研究領域，任何新資料的出現，總會讓人興奮不已，因為這不僅意味着新的課題可待開發，一些熟為人知的歷史過程或許也有會新的解讀。然而，敦煌寶藏一樣的新發現絕無僅有，簡牘、碑文、墓誌等的不斷出土，才是研究者拓展新史料的一般途徑。而隨着近年來史學研究途徑的不斷拓展，一些以往極少為人關注的傳世資料，變為史家的新法寶。其中，醫藥文獻是一大門類。

因側重點不一，學者們對醫藥文獻的利用常存在差異。如以宗教、社會與醫療為重心者，多關注佛道醫方；討論思想、學術與醫學之互動關係者，注目醫理部份。《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一書的作者陳明，則將課題集中在中外醫藥文化交流，常用的史料包括西域出土醫籍、印度阿輸吠陀文獻和傳統醫籍的胡藥胡方。他的研究成果總引人關注，原因或是他能駕馭多種現代

語言以及向來被人視為畏途的梵文，或是他精準解讀諸多原始文獻的功力，從第一部專著《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再到後來的《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他總是借着生僻的外族文獻去構建中古西域地方醫學及自西向東的醫療文化傳播的歷史畫面。今年出版的《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關注的面向更為宏大。

與醫藥相關的研究課題，一般包括醫理、人物、藥品、醫方、場所等，《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厚重的篇幅，基本都有所涉及。對於中、西醫學理論碰撞、交流的結局，陳明用的是「混融」。「混融」一詞並不好理解，因為印度阿輸吠陀衍生出來的西域醫學與傳統的中醫理論，表面上看來有類似之處，前者用四大（地、水、火、風），後者說五行，前者講平衡，後者有生克，實際上，二者得以建立的思維前提，有着如同地理上天南地北一樣的鴻溝，西域而來的理論真正進入中醫理論的核心地帶，絕非易事。而中古時候醫家頑強堅守中醫的體系，又希望吸收採用新穎的西域學理，因而出現諸如「一脈不調」、「轉女為男」、「三界醫王」異於傳統的理論。這究竟是混雜、混合，還是融匯一體？陳明顯然沒有過多估計諸多理念透露出來的中西醫藥間相互融合的力度。採用「混融」一詞來概括，再合適不過。

在人物的討論方面，該書的選材也非同一般，乃當時的入華胡人。依常理判斷，胡人染病後，應採用他們自己文化體系內的醫療方式，只是入華的人群畢竟為數不多，具有深厚醫學修養且能為同族提供醫療者，恐怕遠不如故地。殘酷的現實，似乎預示着胡人們將陷入缺醫少藥的境地。而接書中的觀點，他們並不必為醫療難題擔憂，華夏世界的岐黃學術成為他們度過疾病苦厄的主要手段。具體的醫療手段方面，除了岐黃醫學外，西域醫藥、方術咒語都包括其中，提供醫療協助者，也有他們的同類。能醫的胡人或為僧人、或為術士，不一定都是職業的醫者，但無一例外都擁有獨特的醫療方式和神奇的醫治效果。胡人入華之現實意義，當然不僅僅是增添華夏的醫療活動，使華夏醫學理論更具多樣性，因為伴隨着他們到來的，還有中西交流極為頻繁的契機：西方思想學術以不同方式進入中土，直接影響中土民眾生活的各種物質也將不期而至。大的歷史背景決定醫療領域直接作用於疾病的藥物、醫方，必然增加一些舶來的因素。

藥物方面，南朝梁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中，已加入多種外來藥物，唐代時朝廷頒發的《新修本草》加入的更多，當時社會上還出現一部名

為《胡本草》的專書，以至五代時，彙聚成一代名著《海藥本草》。以往研究者多將《海藥本草》作者李珣認定為穆斯林，陳明則饒有新意地斷定為景教徒，而且還在《海藥本草》的文本中探尋不少大秦藥物的蹤影。不管事實如何，李珣乃胡人後代，思想文化基本漢化，本人也不以善醫知名，之所以不遺餘力去整理前代引入的舶來藥物，目的或許正在告訴世間其先人來華的有益貢獻。

在時間大流的沖洗下，李珣欲言又止的願望無疑得以實現，因為脫離時代背景的後來人總會從自己的立場考慮先人的作為。回到歷史情境下，域外之人則未必都抱着偉大理想來到中土，他們之中或有人為宗教理想，幾經艱辛到東方來解救尚且缺乏人生智慧的民眾，精神行為都值得高度肯定，但更大一部份人的旅程恐怕無關理想，利益才是他們的原動力。書中用「商胡則自誇」形容販賣舶來藥材胡人的形貌，形象生動。如陳明考述，唐宋時期胡商往來頻繁，善於營銷，而且與現代商人一樣，為了利潤常誇大其詞，以次充好，甚至真中雜偽，造假品。站在後來人的角度，我們並沒有理由指責胡商的自誇，因為他們帶來的域外藥物品種，早已成為中土民眾治病療傷的重要資源。

有新的藥物，不代表就可以直接運用，傳統岐黃醫學有着成熟的性味理論體系，新藥物只有經過嚴密的實踐判定，才得以進入本草的行列。中古時期人們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許多帶有胡藥的醫方組合搭配合理，用法成熟，也被當時的醫家收錄入著作。甚至有些醫方起源異域，因效果良好，直接被引入。這些醫方關涉到各類疾病，經歷代使用，外來色彩逐漸消退。如《千金翼方》的阿伽陀丸，陳明認為印度阿輸吠陀有類似原方，之後借由佛典的傳播，被引介進入中國。與阿伽陀丸有類似的，《近效方》的醫方，乃至特定的按摩療法，同樣如此。

經不同途徑、媒介而進入中國的醫理、藥物、醫方固然值得討論，接受、傳播外來醫療文化的場所又如何？誠如前面提到的，佛教經典乃域外醫藥流傳的重要媒介，佛教徒的醫療知識與傳授，免不了變成域外醫藥登陸的前線。陳明對此也有充分的考慮。胡僧的活動、不斷被提及的佛教醫王耆婆、佛經指示的醫藥用法、與佛教關係密切的道教徒的煉丹行為，成為考察的對象。他甚至將場所擴大到希臘、波斯、伊斯蘭及中途國家于闐，即自西而東的絲綢之路的廣闊地域，去勾勒外來醫藥文化傳來的重重陣營。

或許我們立足於域內的歷史文化，還想進一步了解外來醫藥日常實用如何、本土醫家運用外來理論的程度如何、為數眾多的方藥本土化如何等。但

這些並無關本書的主題。因為作者重在中西之間接觸與交匯的歷史景象，鮮明的視野及深厚的根基，使得他借着醫理藥物、人物場所一系列課題，將原本零零散散的、明顯帶有外來氣味的醫藥資料串成一片，並進而一步步呈現中西交通、社會醫療的各個片段。他的研究，讓中古時期豐富歷史進程的研討，多了新的依據。

肖 榮

深圳大學歷史系

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462頁。

任建敏的《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一書，嘗試以地域社會史的取徑，依據大量的文集和方志材料，跳出對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的學術思想等問題的討論，將這三人的活動放入16世紀西樵山的發展脈絡中，探索三者在西樵山的歷史變遷中的作用與影響。按作者的話說，這「不是一本討論湛若水、方獻夫、霍韜這些歷史著名人物理學思想的哲學史一類的著作，而是想從地域社會史的角度出發，研究與西樵山關係密切的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及其創立的西樵山四書院對西樵地方社會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頁461）。全書緣起於作者對由宋到清「羊城八景」的考證，進而發現了西樵山這一萬曆三十七年（1609）之後進入八景行列的地方。西樵山由寂寂無名到與羅浮山並稱，成為「南粵名山數二樵」中的「西樵」，這一歷史過程與湛若水、霍韜、方獻夫三人在此地的活動密切相關，其中又以四所書院的修建而較為顯著。圍繞着三人在西樵地方的活動，特別是以書院為中心，將三人與西樵山的歷史變遷相結合的討論，是本書中最為主要的內容。書院的建設為西樵山奠定了「理學名山」的地位，向「文翰樵山」的轉變也與書院的衰落有關。

全書正文共分為五章。從全書的篇章結構安排來看，第一章以「正德嘉靖年間的社會與禮儀變遷」為題，討論西樵山聲名鵲起的歷史契機，包括嘉靖年間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相繼出山、珠三角的宗族建設、魏校的禁毀淫祠和正德嘉靖年間的講學風氣等問題。西樵山地位的上升與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在嘉靖年間「咸獲登用」有關。從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